

我的田野調查經驗

劉枝萬

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

要談我的田野調查經驗，從我年輕時所受薰陶的學風背景說起，或許比較能讓大家瞭解我個人田野調查的精神所在。

一、學風的比較

日本自明治維新、力圖開始現代化後，為打破舊日制度、建立新制度，日本在法律、社會、藝術、教育等各方面一心模仿歐美；由於德國民族性與日本幾近相似，其軍事、工業水準又是世界一流，因此德國更為日本全意模仿的目標。

日本從高等學校開始，所學習的第一外國語為英語，第二外語則是德語，有些科系，甚至第一外國語即為德語，所用的書籍也盡仿效德國，此因德國系統的學風頗適於日本。「質實剛健」的民族性，日本做學術的風氣，也正是此種民族性的反映。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，學風自然亦深受影響；像我這一輩的研究者，大多留學日本，所受的影響更是不小。在此，我們應該要能分辨「學風」與「日本精神」的不同。

「質實剛健」的學風，使日本的學者很自然想去研究自己的鄉土，如此，才能強調自己民族的優秀，提出民族優秀的證據；所以，戰前的日本，鄉土研究已蔚為風氣，尤其是昭和初年，小學教育即已提出「從鄉土出發，回歸鄉土」的口號，鄉土志也編纂甚多。當時台灣的國民學校、公學校，也是一樣編輯了不少鄉土志。

日本在台灣、華北、東北等地區所做學術上的田野工作，最大特色是學者與軍隊一起到處跑——日本軍隊到哪，學者即跟到哪，不但隨時在做，而且非常辛苦。例如已刊印的華北農村調查資料，我們從其中可以看出日本學者所下功夫之深，在沒有錄音機的情況下，一切資料只能速記，却做得相當好。

戰爭結束，一切的田野工作僅能集中在日本。日本政府於中央設立文化廳（如我們的文建會），各地方則設立教育委員會，由地方的有志者加入為會員，這是行政系統外，由官民合辦、管理地方教育的一個建議團體，與本地的文獻委員會性質類似。文化廳動用教育委員會對各地方的民俗習慣做了許多調查，從事於此的多是地方、民間的學者，或是委託各地方的大學來做。累積到現在，份量已有數百冊；有的一個題目做一本，一個地方做一本的也有，水準都很高。各地方也為自己的鄉土編地方志，水準之高，數量之多，可能是世界第一；因為，即連歐美國家也少見這種做法。日本的各級行政區劃——都、道、府、縣、市、町、村，都有地方記錄，即使最貧窮的縣如沖繩（琉球），所編縣志的份量也相當於本地的省通志。相較於日本的作為，台灣在鄉土資料的調查、收集與編纂的重視程度上，實有天壤之別。

對比於另一個也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國家——韓國，其發展上的差異頗值吾人深思。

朝鮮原是一獨立的國家，日本離開，教學人才一空，本國的年輕學者馬上升起來當教授，

補日人留下的空缺，其新陳代謝率就快速完全的轉換過去了。反觀戰後台灣，日本人一撤走，外省籍教授便來遞補、接替，台灣的學者則沒有升補的機會。

韓國人獨立國的自覺極深，性格又極烈，在日本人統治期間非常勇於反抗，因此吃了不少苦頭，而對日本人有很強烈的氣憤、敵愾之心。戰爭結束，為提倡國粹、韓國精神，大學國文系教授擔起了田野工作。儘管在日本統治的時代，唸法科、醫科，當律師、醫生，對讀書人而言比較有出路，但韓國依然出了不少詩人、藝術家、文學家等各方面的人才，使韓國在戰後田野工作人才的補充上，比台灣有辦法。韓國人聰明的地方在：雖然他們在情感上氣憤日本人，却能在理性上承認日本學術的進步，隨時派留學生去日本唸書，不但全力模仿日本，還要趕過日本。他們和日本一樣，設立了類似文化廳的機構，各大學也自己去做，從出版書籍的形式到田野工作的調查項目等，韓國幾乎一一仿效，成績也極好。日本人看韓國做得好，再回過頭來將韓文成果翻成日文，做為日本研究韓國的一手資料。此外，韓國人最想要日本的科學技術，如電子、造船、汽車……等，極力模仿日本之餘，甚且超越日本，和日本人搶起生意來了。這和台灣是一八〇度的反比。

戰後台灣，大陸政權一來，馬上強調民族精神，一概抹去日本色彩，冀圖掃除日本文化，以大陸文化來代替；從此，台灣的文化是大陸文化，留學的對象變成美國。韓國則不然，所以他們做得好，我們做得不好，原因之一，即是政策的關係。

二、個人的回顧

我從日本留學回來後，即在埔里初級中學當歷史教師，同時編輯埔里鄉土志。不久，今日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前身——台灣省通志館成立，主任是林獻堂先生。這個機構設立的動機，是由於二二八事件後，文化人沒有出路，政府怕他們心存反抗，所以成立了此一閒機關，以閒職安插這些文化人；有幾個台灣文化協會相關的人，如張文環、廖漢臣、王詩琅，即在其中。在內政部有關編纂的法律裏，開宗明義即說：修地方志，目的在強調民族精神；這是與學術無關的態度，因此也都是一些過時政客在擔任主任委員，不屬於教育廳，而歸屬於民政廳。

戰後初期，地方會做田野工作的人，多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地方研究者，以臺南為例，莊松林、吳新榮等人都曾在「民俗台灣」寫過東西。他們熱心、熟悉地方人事，只可惜學術基礎不夠，所以成就有限。無論如何，台灣研究的風氣，在當時却曾風行一時，這是因為人心在戰爭結束後放輕鬆了，心中對於回歸祖國有期待，自然對鄉土產生熱愛的心理。但二二八之後，一切就走樣了。文獻會逐漸變質為行政機關，研究台灣的熱潮也一時消沈下來，因為出路差，大學生中想做台灣研究的人也極少。現今，台灣人意識覺醒，台灣研究再度興盛，這是始料未及的。

我在修鄉土志的時候，需要做田野，我到南投縣政府文獻委員會當委員，編縣志時，也需要做田野；後來換至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我的職位是採集組長，更需要常常做田野。在我擔任台灣省立博物館副研究員時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，當時人員很少，凌純聲所長不但注重地方研究，也肯定田野工作的重要，所以，他要求我來民族所。凌所長有個正確的觀念，他認為：要研究台灣，就應該要用台灣人。因為，第一即會碰到語言問題，當然還

有其他種種緣故，所以，劉斌雄比我還早來。

我來民族所的任務，即是要做田野工作，並且集中在民間信仰上面，因為我在文獻會任上，已有寺廟調查的基礎，到民族所後，再做學術性高一點的工作。所以，從過去到現在，我一直以田野工作為中心，所寫的作品，完全是第一手資料，這和我所受日本教育中「質實剛健」的學風，是有關係的。

「文章千古事」，第一手資料構成的文章，別人很難推翻。例如凌所長對自己赫哲族的調查並不滿意，但從學術界來看，其第一手資料的貴重價值到今天還是一樣的。猶如凌所長告訴我：「資料要發表」，我希望年輕一代研究者，能盡量做田野工作，累積到一定程度就該發表，不要放太久。

三、田野工作甘苦談

過去做田野，第一個困難是經費少，出去工作非常節省。第二是交通問題，有的地方一天只有兩班車可到，光是往返，可能就得耗費一天的時間；如果遇到胡亂指點的人，更會白白奔波。食是很大的麻煩，以前只有路邊攤，沒有麵包可以買，碰不到吃的，往往會餓上一天。至於住宿，那時大多住「販仔間」，一人一天五元，雖然便宜，衛生條件却太差了。

和從前比較，現在的田野工作是舒服多了，但，田野資料的質，反而沒有過去的好。這是因為以前的人搬遷少，較沒有異動，當地人說的話，都很可靠。例如有一次我問旅社掃地的歐巴桑，哪裏在拜「樹仔公」，她一報就是二十個地方，因為她從年輕拜到老，知道的很確實。但是社會現代化以後，很多事情不一樣了；以王爺信仰為例，過去的人常在瘟疫發生後，不得已才去拜這些原本是鬼或動物的「王爺」，現代人却強加附會，連形成的傳說都遺忘了，被一般的（流行）文化遮蓋了。又例如廟宇的沿革，過去口傳的多，寫成碑記的少；做碑時，在文字上會加油添醋，口傳的保留本質，反而比較真實。所以，做田野工作要小心，文字未必比口傳可信。

有一次，我在霧社、盧山訪問一個泰雅族人：「人死後靈魂會去哪？」他從「死後靈魂會過橋」說起，盡是日據時代蕃人調查書中所沒有的講法，我覺得奇怪，經再三逼問，他才道出一切是從讀者文摘看來的。換句話說，教育普遍，資訊流通，原來知道的東西就會不純粹了。

澎湖一個土地公廟，碑記記載該廟花費了數百萬重修，後來才探知：這個驚人數字指的是舊台幣。做田野工作，在這些小地方上，都要特別仔細、小心。

總而言之，過去的田野工作困難較多，資料得的也較慢，但質比較精；現在，則恰巧相反。這種情形不獨台灣，日本亦然。

四、田野工作的技巧與守則

做田野時機很重要，農忙時不要去，年節也不好，冬天比較合宜，例如「謝平安」時，大家就比平時閒了。

探訪的對象最好是男的，一方面因為女人沒主權，不敢隨便說，免得回去被丈夫罵；另一方面是有些事，例如做醮，男人比較清楚。

錢財方面的事，一般都不太肯說，問的時候就需要很技巧，很簡潔；如果問不到，就要放棄。

拍照、錄音，都是應該善用的重要技巧；現在的機器輕便好用，看到什麼都要拍，聽到什麼也最好盡量錄。當然報導人對機器的反應，田野工作者要能觀察、分辨和對應。對神明照相，要留意廟裏人的反應。

出去做田野，首先要很有禮貌。比如到廟宇，無論你信仰什麼，手上有沒有香枝，都應該用手對神禮拜，這是打招呼，是禮貌，與教義、教派無關。

像我做司公的研究，就花了很多時間才打進這個封閉式的特殊職業團體，和他們一起吃、一起睡，我問他們的都是正經事，時間久了，他們才慢慢信任我，而這些都是做田野該有的禮貌。

五、結語

從事田野工作的人員，當然也有好壞的區別，這可以從天賦和修養兩方面來看：容貌親和的人，在田野裏比較容易與人接近，但後天的練習，還是可以彌補天賦的不足。良好的訓練，可以造就獨當一面的調查人員。

台灣的田野工作做得不好，因素固然很多，但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的士大夫觀念作祟，而在心態上看不起田野工作、教育上不注重田野工作，却是主要的成因。

我們應該要明白：田野工作需要腳踏實地，從中所獲取的一手資料，生命較為長久。以兩篇文章來論，一篇講空洞的理論，一篇有紮實的田野資料做基礎，最後勝利還是後者的。

(整理：詹素娟)